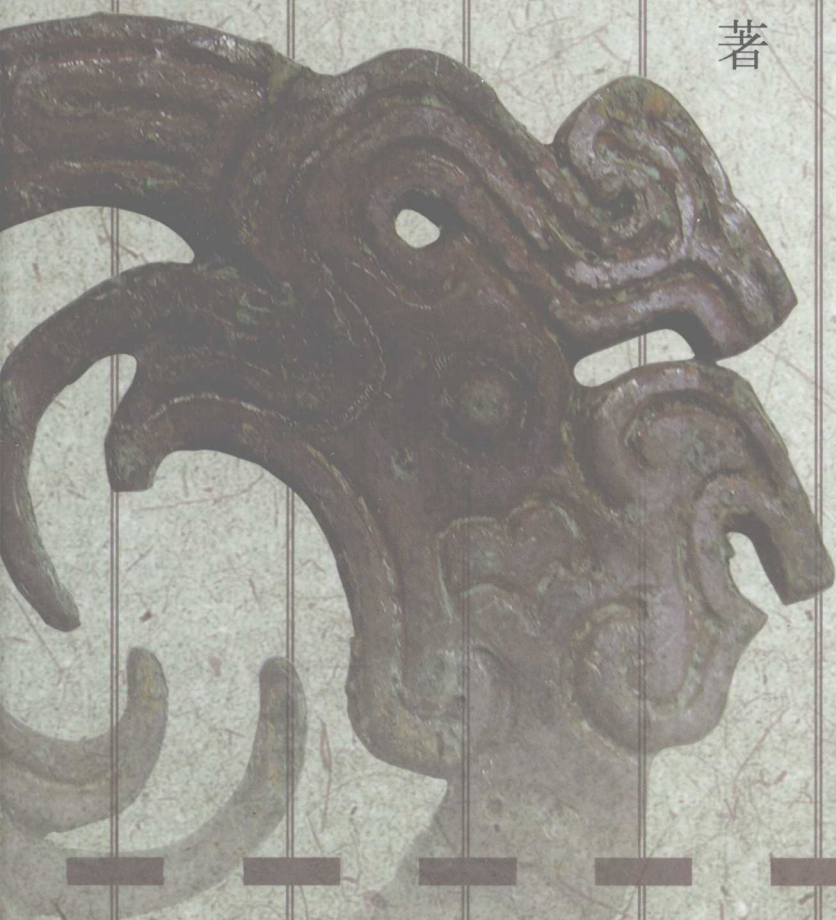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学术研究丛书

# 周秦文化 研究论集

张天恩 著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学术研究丛书

# 周秦文化研究论集

张天恩 著

科学出版社

北 京

## 内 容 简 介

本书收录了有关周秦考古、文物和历史研究方面的论文 31 篇,分为两部分。上编为周文化研究,主要涉及周民族早期考古学文化的特征、年代、渊源和历史地理等问题,及与之相关的商王朝、古羌族及北方草原民族等考古学文化的关系,周公、单氏家庭等西周世族的文化遗存,西周的采邑制度,早期楚文化的线索,以及西周青铜短剑的谱系、文化来源等问题的研究。下编为秦文化研究,主要探讨了早期秦民族与周王朝的关系及其崛起于陇右地区的历史根源,早期秦文化的特征及形成的时代,礼县等地有关考古发现的意义,西戎文化的面貌和内涵,早期都邑犬丘的地望,大堡子山秦公墓地的主人及此处秦公墓对秦国陵墓制度的影响,秦国早期金器、铁器发现的意义,秦式短剑的渊源、类型及与其他地区青铜短剑的关系,秦公钟的属主等问题。书中对周秦文化涉及的许多重要问题都有深入的分析研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本书可供从事古代文物、考古、历史研究的工作者、大专院校相关专业师生及历史、文物和考古爱好者阅读和参考。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周秦文化研究论集/张天恩著. —北京:科学出版社, 2008

ISBN 978-7-03-023050-8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学术研究丛书)

I. 周… II. 张… III. 文化史—中国—商周时代—文集 IV. K220.3-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147560 号

责任编辑:海 宁 / 责任校对:宋玲玲

责任印制:赵德静 / 封面设计:北京美光制版有限公司

**科学出版社 出版**

北京东黄城根北街 16 号

邮政编码:100717

<http://www.sciencep.com>

**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科学出版社发行 各地新华书店经销

\*

2009 年 1 月第 一 版 开本:787×1092 1/16

2009 年 1 月第一次印刷 印张:21 1/4 插页:1

印数:1—1 300 字数:500 000

**定价:12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我社负责调换〈科印〉)



## 作者简介

### 张天恩

陕西宝鸡人。先后就读于宝鸡师范学院和北京大学，获文学学士和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任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研究员、商周研究部部长，西北大学兼职教授，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参加过周原、郑家坡遗址发掘，主持过福临堡、原子头、朱马嘴、关桃园、神禾塬、梁带村等新石器、商周及战国秦汉时期遗址及墓地的发掘。主要从事新石器时代和夏商周考古学研究，已出版《关中商代文化研究》、《宝鸡福临堡》、《陇县原子头》等著作6部，发表学术论文《高领袋足鬲的研究》、《试论关中东部夏代文化遗存》、《川口河齐家文化陶器的新审视》、《试论关桃园前仰韶时期文化遗存的相关问题》等80余篇。

谨以此书庆祝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成立 50 周年！

## 序 言

2008年9月，是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建院50周年华诞。

50年前，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当时的名称是中国科学院陕西分院考古研究所。1963年归属陕西省社会科学院，更名陕西省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后又改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所。1984年改变隶属关系归陕西省文物局领导。2006年12月31日，经陕西省编制委员会批准，更名为陕西省考古研究院。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是全国成立最早、规模最大的省级考古科研机构，主要承担陕西省境内的考古调查、勘探、发掘和研究工作。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成立至今，先后在省内组织开展了许多重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从史前时期的南郑梁山、大荔甜水沟、洛南龙牙洞、西乡李家村、宝鸡关桃园、临潼零口、彬县下孟村、临潼姜寨、南郑龙岗寺、临潼康家、华县泉护村、佳县石骡骡山等遗址，到历史时期的商州东龙山、礼泉朱马嘴、武功郑家坡、清涧李家崖、扶风周原、岐山周公庙、沔东西周官室遗址，眉县杨家村西周青铜器窖藏，韩城梁带村墓地，凤翔秦都雍城、咸阳遗址，秦始皇陵，秦东陵，商州商邑遗址，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杨家湾汉墓，神木大保当彩绘画像石墓，北周武帝孝陵，北周安伽墓，唐昭陵北司马门遗址，唐乾陵陵园建筑遗址，唐僖宗靖陵，唐顺陵，唐李宪惠陵，唐懿德、章怀、惠庄、节愍太子墓及永泰、新城公主墓，法门寺佛塔地宫，何家村金银器窖藏，铜川耀州窑，西安南郊明代秦王家族墓，大荔清代李氏家族墓，等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又迈出省界，先后协助香港特区发掘扒头鼓和沙下遗址；协助西藏自治区文物普

查、合作调查和发掘古格故城、萨迦寺遗址；参加国家文物局组织的青藏铁路（西藏自治区）、三峡工程（重庆市）、南水北调工程（河南省、湖北省）中遗址和墓葬的考古发掘研究及考古工程监理工作；参加“早期秦文化调查研究”（甘肃省）、横水西周墓荒帷提取与保护（山西）、德安宋墓壁画揭取与修复（江西省）、繁峙宋墓壁画揭取与修复（山西省）工作。

2006 和 2007 年，我院又踏出国门，参加越南永福义立遗址的发掘研究。

50 年来，得益于陕西得天独厚的丰富的地下遗存，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努力，陕西省考古研究院调查、发掘了上千处大、中、小型遗址、陵墓。其中秦始皇陵兵马俑坑、铜车马坑、石铠甲坑，秦公一号大墓，汉阳陵南区从葬坑、帝陵从葬坑、南阙门，唐法门寺地宫，唐懿德太子、章怀太子、永泰公主墓，耀州窑等重要遗址和墓葬的发掘和研究，为秦始皇陵兵马俑博物馆、秦公一号大墓博物馆、汉阳陵考古陈列馆、法门寺博物馆、乾陵博物馆、耀州窑博物馆的建设奠定了基础；先后出土超过 20 万件包括金银器、青铜器、铁器、陶器、玉石器、漆木器、纺织品等在内的各种材质的珍贵文物标本，为包括国家博物馆、故宫博物院、陕西历史博物馆、北京大学赛克勒博物馆在内的数十家博物馆和大学考古专业标本室提供了大量的文物展品和教学标本；先后参与、完成秦始皇陵、汉阳陵、周原、周公庙、汉茂陵、唐顺陵、秦都雍城、秦都咸阳、法门寺地宫等数十个大遗址、大型考古发掘研究项目的文物保护规划制定或出土文物的保护修复工作，为大遗址的保护，为文化遗产的保护，做出了贡献；先后出版考古发掘报告和学术专著近百部，发表论文 1300 余篇，出版学术期刊《考古与文物》166 期，为研究人类起源、农业起源、文明起源、国家起源和周秦汉唐文明乃至中国考古学、中国古代历史、东西方文化交流等提供了大量珍贵的实物资料，发挥了不可或缺的作用。

子曰：“五十而知天命”。一个人生存在世上 50 年，可知“天命”；一个研究机构成立 50 年，也应该知道、把握“天命”。研究机构的“天命”就是研究，研究，再研究；不应为世事俗务所扰，不应为功名利禄所动。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务会及学术委员会讨论决定：用深化研究来庆祝“天命之年”，在继续出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田野考古报告》丛书的基础上，陆续启动出版《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学术专题研究丛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保护修复研究丛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专家学术研究丛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文物精品图录丛书》、《陕西省考古研究院学术研究译著丛书》等，力争全方位、多角度地刊布、展示和反映考古发掘、文物保护的研究成果，促进学术研究的开展。

2002 年，我院开始将已经出版和即将出版的考古报告汇集为一个系列。第一本封面印上“陕西省考古研究院（所）田野考古报告”字样的是《神木大保当》，编号是十九；时至今日，我院出版考古报告的总数已超过 50 部。这 50 多部考古报告展现了我院 50 年的发展历程，展现了几代考古人或坚实稳固或迷茫踉跄的历史足迹，展现了年轻的考古工作者对学术研究春天的企盼和信心。

50 年来，在编写、出版田野考古报告的同时，我院的专家、学者们还完成、出版了部分考古学术专著、文物保护修复著作、集体或个人研究论集以及精品文物图录，但和考古报告的编写出版相比，投入较少、数量不多、也不成系列。

众所周知，考古报告的主旨是客观、科学、全面地刊布田野调查发掘资料，以便学术研究和文物保护工作的开展。限于体例、时间和篇幅等原因，考古报告有时难以充分体现研究成果，为了全面反映研究成果，一篇篇论文、一部部专著、一本本图录以不同形式、在不同的出版机构、不同的刊物或同一刊物的不同期号刊发，其学术价值和意义显而易见。但是，对作者来讲，个人编

著的学术专著、论文汇集、精品图录等因经费问题难以面世，对不同领域、不同兴趣的研究人员来说散见的研究论著，查阅使用很不方便；同时既不利于看出一个人的研究历程，也不利于学术研究的进展。我们相信，随着今后我院不断地把各类研究成果系列化，将专家们个人的学术论文结集出版，一定会使我院的学术研究进一步科学、规范和深入，也能为祖国的考古学研究、文物保护研究提供更多、更新的基础资料。

陕西是一片肥沃的土地，地下蕴藏着非常丰富的文物古迹。我院的研究人员，长期奔波于田野，耕耘于书桌，用自己的辛劳收获了一批又一批珍贵文物，用自己的汗水浇灌出一朵又一朵成果之花。可以说，他们无愧于时代，无愧于陕西这一片神圣的土地。系列结集出版他们的研究专著、学术文集、保护修复报告、精品图录、学术译著，既是繁荣学术的好事，也是对他们的辛勤劳动及其成果的尊重和一片敬意。同时，也希望这一举措能够起到激励后学的作用。

学术研究是一项艰苦而寂寞的工作，同时也是一个不断进步、不断深入与不断完善的过程，学术研究成果的发表只是这一过程中短暂的一个瞬间。因而我们的学术成果不可能尽善尽美，不可能没有错误，正像我们已经出版的考古报告及研究专著既有上乘之作，亦有不少失误一样，我院即将系列结集出版的各类学术成果，尽管经过了作者的长期笔耕、细致筛选与院学术委员会的讨论评审或院外专家的匿名审定，但是，难免会出现这样那样的失误或错误，学术观点也未必充分成熟或完全正确，欢迎方家教正。

谨以为序。

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 焦南峰

2008年5月4日于泾渭基地

# 目 录

|         |     |
|---------|-----|
| 序言····· | (i) |
|---------|-----|

## 上编 周文化研究

|                             |       |
|-----------------------------|-------|
| 先周文化早期相关问题浅议·····           | (3)   |
| 周人早期历史地名的再考察·····           | (12)  |
| 试论太王传位季历的目的和意义·····         | (19)  |
| 高领袋足鬲的研究·····               | (26)  |
| 碾子坡类型刍论·····                | (40)  |
| 古密须国文化的初步认识·····            | (52)  |
| 殷墟卜辞所记“羌方”的考古学文化观察·····     | (61)  |
| 关中西部商文化研究·····              | (71)  |
| 关中西部商文化的族属讨论·····           | (105) |
| 晚商时期陕西地区考古学文化与殷墟商文化的关系····· | (111) |
| 邹衡先生先周文化研究的贡献与影响·····       | (132) |
| 周公庙遗址发掘涉及的主要问题·····         | (140) |
| 从“迷盘”铭文谈西周单氏家族的谱系及相关铜器····· | (143) |
| 西周虢氏遗存几个问题的探讨·····          | (151) |
| 丹江上游西周遗存与早期楚文化关系试析·····     | (166) |
| 论西周采邑制度的有关问题·····           | (176) |
| 考古发现的西周采邑略析·····            | (186) |
| 中原地区西周青铜短剑简论·····           | (196) |

## 下编 秦文化研究

|                      |       |
|----------------------|-------|
| 周王朝对陇右的经营与秦人的兴起····· | (209) |
|----------------------|-------|

|                           |       |
|---------------------------|-------|
| 早期秦文化特征形成的初步考察 .....      | (216) |
| 礼县等地所见早期秦文化遗存有关问题刍论 ..... | (228) |
| 甘肃礼县秦文化调查的一些认识 .....      | (238) |
| 试说秦西山陵区的相关问题 .....        | (245) |
| 古代关陇通道与秦人东进关中线路考略 .....   | (256) |
| 边家庄春秋墓地与汧邑地望 .....        | (265) |
| 秦器三论——益门春秋墓几个问题浅谈 .....   | (272) |
| 再论秦式短剑 .....              | (281) |
| 对“秦公钟考释”中有关问题的一些看法 .....  | (298) |
| 读石鼓文研究札记两则 .....          | (307) |
| 新出秦文字“北宫乐府”考论 .....       | (311) |
| 东周列国贝化的考察 .....           | (318) |
| 后记 .....                  | (327) |

# 上编 周文化研究



# 先周文化早期相关问题浅议

先周文化研究从一开始就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sup>[1]</sup>。后随着武功郑家坡<sup>[2]</sup>，扶风北吕<sup>[3]</sup>、刘家<sup>[4]</sup>，长武碾子坡<sup>[5]</sup>等处早于西周的遗址、墓地资料的公布，出现了更热烈的争论，其焦点则是对太王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早期的认识。

我们以为，不能确定早于迁岐以前的先周文化，就无法使这一课题深入下去。认不出更早的先周文化，而去探讨诸如先周文化的渊源、文化特征、与相邻考古学文化关系等问题，都只能是无的放矢。

迁岐以后，周人与古羌人的一支姜姓民族通婚，结成政治联盟，又与西北、西南其他部族广泛联系，在考古学文化上，必然会出现融合的趋势，面貌更为复杂。

所以，不宜以这类较晚的复杂的文化面貌，去类推更早的先周文化。尽管这样的类推也不失为一种有用的方法，但它毕竟不是唯一的和最好的方法。

近年陕西商文化研究有了明显的进展，先周文化是商代关中一支地方文化，故通过对关中商文化的分析，去认识较早的先周文化及有关问题，必能有许多新的启迪。

## 一、关中商文化略析

关中目前已发现了与河南郑州和安阳等处相应的早、晚商文化的序列，但其分布范围却有较大的变化。以商文化序列作标尺，以分布区域为依据，衡量关中商文化的遗存，可将其分为三个时期。

第一个时期，商文化的分布主要在泾河下游和西安以东地区。以华县南沙村<sup>[6]</sup>，蓝田老牛坡<sup>[7]</sup>、怀真坊<sup>[8]</sup>，耀县北村<sup>[9]</sup>等遗址为代表。基本上都发现有二里岗上、下层时期的商文化遗存。因此，关中商文化第一期的年代，应相当于二里岗下层至二里岗上层偏早阶段。《诗·商颂·殷武》说：“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前人或谓氐羌的分布约在陕西的西部及附近<sup>[10]</sup>。今在关中西部发现了与羌人有关的刘家文化，可证此说不误，也印证了《商颂》的记载，说明商王朝一建立，就据有关中东部地区。

第二个时期，含商文化因素的遗址，向西已推进到关中西部的扶风、岐山县境内，渭河以南，已达户县。扶风壹家堡<sup>[11]</sup>、岐山京当<sup>[12]</sup>、礼泉朱马嘴<sup>[13]</sup>等遗址可以代表。这些遗址中大多均发现有殷墟一期或殷墟二期偏早的遗存。可见这一期的年代约相当于二里岗上层偏晚阶段到殷墟二期偏早阶段，绝对年代不会晚于武丁以后，泾水和漆水下

游在此期均有商文化遗址发现，而正是此期偏晚的卜辞上发现有关周的记载，表明这是商周两种文化对这一地区的争夺。

第三个时期，关中地区的商文化遗址发现甚少，仅在渭河南岸的袁家崖<sup>[14]</sup>等地稍有子遗，而文化面貌与殷墟有所不同，年代相当于殷墟三、四期。此期是商文化在关中全面退却的阶段，关中的大部分已为先周文化所据有。史称文王时“三分天下有其二”，似乎可以得到考古学上的证明。这一期年代较晚，大体相当太王迁岐及以后，与我们讨论的重点关系不大，故从略。

关中第一期商文化与郑州商文化比较一致，“老牛坡商文化早期基本与郑州二里岗商文化相同”<sup>[15]</sup>，北村早期的商文化与郑州的典型商文化具有许多共同因素<sup>[16]</sup>。即其基本是以原貌出现在关中的。某些不同是未发现郑州的部分器物，另有某些因素，如常见的花边罐等从不见于郑州等地同期遗址之中。不见于郑州等典型商遗址的花边罐，必非商文化因素，而应是关中的地方文化因素无疑。这类花边罐不仅见于关中商文化第一期，在第二期偏早的贺家等地商文化中亦可见到，足见这类地方因素的影响之深。但在商代关中地方文化，如先周、刘家等文化中均未见到，故其与这些地方文化的关系，尚是一个需要探讨的问题。又说明先周文化早期的特点，在第一期商文化中没有明显的反映。

第二期商文化中的地方因素，与第一期相比，大为增加。如经过发掘的扶风壹家堡，关中地方文化因素占40%<sup>[17]</sup>的比重。而商文化和关中地方文化的混合因素，加上商文化因素，占58%，故将这一期定为殷文化势力的范畴。而属于商文化的因素，自然不可能是寻找早期先周文化的目标。壹家堡第一期的第二类因素，占遗存量的40%，又被称为关中地方因素，从商文化中分了出来，其不是商文化自然无疑。

《诗·殷武》和武丁时期卜辞的有关记载，说明关中与商文化发生过关系的有氐羌和周人。因而，商文化遗址中的地方因素，应与氐羌或周人有关。也就是说这类地方文化因素，不失为寻找和确定更早的先周文化的一个重要线索。

## 二、先周文化早期遗存的再认识

目前，关中地区除商文化以外，被认为早于太王迁岐，并被指称为早期先周文化或先周文化一个类型的遗存，大致有三类：一、漆水流域以郑家坡早期为代表的遗存；二、宝鸡市附近以金河、石嘴头等处为代表的刘家文化早期遗存；三、以碾子坡早期为代表的泾水上游地区的一类遗存<sup>[18]</sup>。

第二类遗存，即金河等地刘家文化一、二期遗存，年代我们推断为二里岗上层和殷墟一期<sup>[19]</sup>，与关中第二期商文化的年代相当或略早。但刘家文化一、二期的代表器物高领袋足鬲，单耳、双耳、腹耳的高领圆腹罐，与壹家堡一期关中地方因素的联裆鬲、折肩罐等，没有共同之处，足证壹家堡的地方因素绝不是刘家文化一、二期的特征，即

其不属于刘家文化。刘家文化与氏羌民族有关，因此壹家堡的地方文化因素，就非与氏羌有关的文化遗存。在壹家堡一期内，刘家文化因素被划分在不足 2% 的第四类因素中，称为与陕北河套有关的文化因素。但其中实含有两类不同来源的文化，其一就是刘家文化的因素，均被归入陕北河套因素，实属误解。

在研究壹家堡一期关中地方因素时，发掘者注意到：“它们基本不见于其他地区早于壹家堡第一期或与壹家堡第一期同时的其他考古学文化之中，却在关中地区及其邻近区域的殷商时期的遗址（如武功郑家坡、长武碾子坡等）中常见”<sup>[20]</sup>。说明这类地方因素与郑家坡、碾子坡等遗存有一定的联系。

碾子坡的陶器，常见者有高领袋足鬲、折肩罐、甗、簋、豆、甬、盂、盆、瓮、尊等，另外有数量甚少的联裆鬲。与壹家堡地方因素比较，折肩罐、豆、尊等有类似之处。但壹家堡地方因素只有联裆鬲，与碾子坡高领袋足鬲最为常见，联裆鬲甚少的情況分明不同。碾子坡早期遗存作为一个文化整体，在传播和影响的过程中，不可能、也不应该将其最基本的因素——高领袋足鬲不包括在内。这说明壹家堡地方因素与碾子坡早期为代表的泾水上游的这类遗存，无直接关系。

郑家坡早期常见的是联裆鬲、折肩罐、尊、盆、豆、甬等陶器。纹饰以粗疏散乱的麦粒状绳纹为主，还常见单纯方格纹、弦纹及附加堆纹，鬲、甬口沿多为花边状。这些特征在壹家堡一期的地方文化因素以及混合因素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映。

郑家坡联裆鬲中的“B I 鬲与壹家堡一期第一段的筒状鬲（标本 T23（4）：12）相似；其溜肩盆中的 A II、B II 深腹盆与壹家堡一期第一段的 AC 盆（标本 T23（5）：12）相近；其折肩罐（原《简报》称尊）也与壹家堡一期第二段的 AC I 折肩罐接近。此外，郑家坡早期的陶器纹饰‘以粗疏散乱的绳纹为主（当即点状绳纹），方格纹比较细小，一般为单纯格纹，方格乳钉纹极少’，这些也都与壹家堡第一期的特征相同”<sup>[21]</sup>。这段话引自孙华同志比较壹家堡与郑家坡早期特点的部分，可以说明两者的相似，我们引来，也就不烦再去列举类比了。不过应强调的是，郑家坡早期陶甬流行腰饰附加堆纹及指窝纹，壹家堡一期陶甬亦多见相同形式。关中及相邻地区商文化及其他年代相当的文化中，均不见这种作风。说明此应是以郑家坡早期为代表的关中地方文化的一个典型特点。

以上的比较，不难看出壹家堡一期中的关中地方文化因素，实际就是郑家坡早期文化的反映。既然，在关中地区与商文化有关的氏羌文化已与刘家文化相对应，那么这类地方文化就应是周人的早期文化遗存了。其与郑家坡早期的基本特点相同，证明了郑家坡早期就是目前所知的早期先周文化遗存。郑家坡中、晚期，北吕墓地等较晚的先周遗存，以及西周早期文化，与郑家坡早期均一脉相承，连续发展的轨迹清楚，对此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因而，郑家坡早期已反映了至今所知最早的先周文化的基本面貌。

### 三、先周文化早期年代的推定

郑家坡先周遗址早期的年代，发掘者推测为二里头晚期至二里岗下层，引起的议论最多。见诸文章者有四种意见：有可能到殷墟二期<sup>[22]</sup>；上限不会超过商王祖甲之时<sup>[23]</sup>；不早于古公迁岐<sup>[24]</sup>；或认为属西周早期遗存，个别出有高领袋足鬲的单位，上限约在文王作丰之时<sup>[25]</sup>。争论的范围跨越了整个殷商时代，前后达五六百年之久。

我们已说过郑家坡早期为目前最早的先周文化遗存，上述各种年代，推测成分较大，我们通过有关资料，可得出一个更为可靠的结论。

长武碾子坡早期的年代被估计为稍早于太王迁岐时期，大致与殷墟二期文化相当<sup>[26]</sup>。这个意见为不少人接受，异议较少。

碾子坡早期的典型器高领袋足陶鬲，偏早者与宝鸡附近所出刘家文化二期的同类器相近，偏晚者与刘家文化三期的标本类似。刘家文化二、三期的年代，我们分别推断在殷墟一期和二期<sup>[27]</sup>。碾子坡其他陶器的特征，则与郑家坡及漆水流域其他先周早期遗址的因素近似。但郑家坡的联裆鬲、折肩罐、敛口瓮等，形态绝不可能比碾子坡的同类器更晚。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武功柴家嘴采集到的两件花边口沿联裆鬲<sup>[28]</sup>，我们在同地采集的另一件花边口沿鬲<sup>[29]</sup>，在郑家坡出过近似者。比碾子坡早期所见的联裆鬲 H131:74、H151:87 等，均体高而拙朴，有更早的特征。故即使认为郑家坡早期比碾子坡晚的同志，也不能不认为郑家坡联裆鬲“形态原始”<sup>[30]</sup>。因而，碾子坡的年代，对郑家坡的早期，是一个很好的说明。

1970年5月，麟游县九成宫镇史家塬遗址出土铜鼎、铜罍各一<sup>[31]</sup>。鼎双耳，深圆腹，空扁锥足，腹饰弦纹两道，与小屯 YM388、Sjm3 所出弦纹鼎全同。这两墓均为殷墟一期的典型单位。罍的年代，邹衡先生早有定论，认为其与郑州白家庄 M2:7 铜罍相似，相当于殷墟一期或略早<sup>[32]</sup>。

我们在史家塬遗址进行过多次调查，并在铜器发现者的指引下，找到具体出土点。发现此外是一处以郑家坡早期堆积和龙山文化为主的遗址。出土点的周围，能采到的全是郑家坡早期的标本。从这一情况看，铜器断不会是龙山时期的埋藏，必是郑家坡先周早期人使用之物。相当殷墟一期的铜器，出在郑家坡早期一类遗址中，本身就是断定其年代的证据。

壹家堡一期 1 段的最早单位是 T23，实际是将方布在一个大灰坑中间<sup>[33]</sup>。此方中仍发现与郑家坡早期相似的关中地方因素。说明该遗址中最早的商文化，也受到了先周文化的影响。故郑家坡早期为代表的遗存的出现，当不晚于壹家堡一期商文化的年代上限，即殷墟一期或略早。郑家坡早期为代表的关中地方文化，既非源于商文化，又不见于周围的其他地区，故不能不考虑漆水流域及附近，就是这种文化，即郑家坡早期先周文化的发源地了。